

走出历史迷雾，重铸中国文化价值

作者：方朝晖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0年5月26日 点击数： 更新

2010年2月10日我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怎么看尊王、忠君和三纲——读刘泽华、王仲文起了一些争议，我相当意外。事实上，那篇文章纯粹是针对刘、张二先生对帝制的看法而发，主旨不在当具体的社会文化处境、从某种抽象的价值原理来理解民主，但并没有批评或反对民主本身；如果说那篇代社会现实而言的，目的是说明儒家“忠君”、“尊王”及“三纲”思想在古代历史条件下的相对合理现实目的，所以只附带提了一句贤能政治。没想到多数批评者都认为我最后提贤能政治与前面为君主制确实是很大的误会。贤能政治与君主制有本质不同，君主制也不能笼统地称为专制制度，三者不能混淆。任何专制；我既未反对民主，更认为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可相辅相成，共同遏制专制。我怎么可能美化君主于3月份分别发表了周思源、王也扬、张绪山三先生的批评文章，限于篇幅，本文不打算对批评观点逐一上的看法。

1、为什么反对民主——专制二分式思维？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对于“民主”的梦想，很大程度上源自从抽象的价值原理出发来理解民主，严件。尽管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均已为民主实践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包括国家分裂、长期内战、外族入梦。正因为长期并未实际生活在民主体制下，人们容易把自由民主制（liberal democracy）想像得无力的药方来拯救他们，而对民主在实践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缺乏清醒认识。对民主的过高期望导致了我所谓‘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典型代表。

任何制度都有价值属性，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制度的价值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文化处境中才能导致脱离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来评判历史。比如说单从制度原理上看，民主制比君主制进步得多，但差当。如果在古代条件下推行民主制，可能后果更糟。即使在今天也不能不顾国情地推行民主。君主制确有除。几位批评者对君主专制深恶痛绝，却认识不到君主制在古代社会条件下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和相对合理谴责上，不能理性地探讨为何民主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并不可行；而对现代非西方社会民主实践中遇到的如归咎于政府不教导百姓之类）。我在文章中提出，“民主政治只不过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制度处境普遍有效的政治制度”，这并不是要否定民主政治的积极意义，而是提醒人们不要脱离社会文化基础主，或评判一种政治制度。

民主-专制二分式思维预设了民主为超越历史时空、超越现实国情的价值标准，导致脱离具体的社会人的价值标准来衡量和要求古人，这对历史是极不负责任的。几位批评者正是从这种思维定式出发，把古人人格尊严的等级森严社会，把儒学当成维护专制的工具，于是乎中国三千多年的历史成了漆黑一团，宛如与今天一样地蔚蓝，古代阳光与今天一样地明媚；古人与今人一样有天高地阔的梦想，有浩气如虹的长歌事业前赴后继、舍生忘死，为千千万万人的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百多年来，对中国古代历史的这脱离历史文化背景的抽象概念误导的结果。它的最大悲剧，就是使我们无法感知与自己祖先精神血脉上的族数千年来赖以立身的根本，更不知古人的精神世界一点不比我们愚昧落后。

2、民主政治与贤能政治在中国文化中的作用

虽然我不反对民主，但认为只有充分认识到在中国文化中实行民主之难，才能真正在中国建立民主。原因在于，中国文化的习性决定了，中国社会最有效的整合方式是以伦理为本位、以贤能为主导和‘以制度为主导、法治至上的社会整合方式形成鲜明对比（已有专论，此处略述）。所谓中国文化的习性，sm，又译集体主义）；“关系”是以“人情”和“面子”为整合机制的，不等同于英文relationship。俾民族经历数千年甚至更漫长岁月的积淀而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孙隆基将这个结构比作“坚固的河房变动。

首先，群体主义与帮派主义、山头主义、裙带关系、地方主义等相连。在中国人的社会里，一切形式是现代意义上的党争，都能造成严重恶果。当党争公开化、白热化后，大众被牢牢捆绑在若干大的利益身正义而斗争；人与人的仇恨日益加深，军阀割据、诸侯称霸乃至国家分裂等均可能由此而起。我提到的‘义基础上的群众运动，近年来在泰国、菲律宾、韩国都能看到。由于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是在彼岸，而是在导致耗费极为庞大的社会资源，严重拖累甚至拖垮整个社会的发展。《尚书》中提出“君子无党，王道彰

有人可能说，现代民主竞选与古代党争不同，效果是正面的。这是对中国文化的逻辑不了解所致，历史文化适合走“礼让”而不是“斗争”之路（熊十力先生已认识到这一点）。《左传》襄公十三年记载晋国格当中军将的范宣子主动让贤，传中赞曰：“范宣子让，其下皆让……晋国以平，数世赖之。”这里，‘国数世之治源于公卿百官“不争”。权位竞争的不断升温可彻底撕裂中国人的人情世界，导致无止境的难以适应中国文化的的原因之一。

其次，关系本位导致社会风气成为中国文化中最强大的力量，比任何制度作用都大。在这种情况下，草”；而一种行为一旦成为风气，就可能撕破任何制度的罗网。民主政治之所以不如贤能政治有效，还因整个社会的风气，导致人心狡诈，社会根基被摧残。千百年来，儒家之所以一直倡导“立人极”，因为在

仿、相互攀比、相比影响主宰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古代儒家强调“以人治人”（《中庸》）而不畏下”（陈亮语），秘密也在于此。

应该认识到，现代西方民主实践的一个重要基础是与基督教有深刻联系的个人主义传统，个人主义与喻的，亨廷顿则分析了基督教对民主的积极作用。尽管个人主义文化中也有党争，也有集团对立，但比走得更多。另外，并非所有的文化都要走个人主义道路。文化人类学家证明了人类文化模式的多样性和不可以问题，但也有个人主义不可替代的优点，最近二十多年的文化心理学研究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文化需要贤人却似乎认为民主政治可以超越古今、超越一切社会文化条件有效，对东亚民主化实践过于乐观，认识不

君主制与贤能政治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贤能政治是“公天下”，出自《礼运》；而君主制是“家天下”正是以贤能政治来制约君主制，才发挥了消解君主专制的积极功能；而在今天，它应当抑制民主政治带来人们自觉走出无止境的纷争；而从大局出发、从民族大义出发、从做人的良知和道义出发的“三纲精神”也是我主张儒家不应当无条件拥抱民主的原因之一。但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并不完全对立，狄百瑞就论证个人自由。我认为，贤能政治今日可以与民主政治相结合，具体途径之一是行业的自治与理性化，后者才包括（1）政治空间的自治与理性化，（2）社会空间的自治与理性化，其特点是以贤能为主导，通过为行制专制和腐败。至于贤能如何选拔，自古以来已有大量经验，不难操作。

3、如何看待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

最近一百多年的历史，是屈辱、痛苦的历史，也是民族文化之根被遗忘的历史；是向另一个强大的历史，也是一个充满了误解和误区的历史。这是一个对外来优秀文化盲目崇拜以至于失去了自我的历史记忆的历史。诚然，西方文化有自身的优越性，但是我们时常在很多不该学习、无法学习或不值得学习值得我们学习的西方文化优秀传统，我们又不能从它们赖以发生的完整处境充分理解，而是一味以救中国邯郸学步式的学习西方，已让我们付出沉重代价。

我不是什么民族主义者，更反对孤芳自赏、夜郎自大的国粹主义。我深信，如果我们有能力摆脱文化的成立，谁也没能力螳臂当车，阻挡历史洪流。但我热爱传统文化，主要不是因为它比西方文化好，而是诉诸它来整合，人生的许多苦痛需要它来医治。就像一棵树上长了病虫害，只能用与这棵树的肌质相对应国文化土壤里生长出来或特别适应于中国文化土壤的治病良方，而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则是西方文化为有效的药方。这些西方药方并不是对中国全然无用，也不是在中国文化中完全缺乏，但不是解决中国问

4、什么是今日中国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

综上所述，我认为今日中国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是重铸中国文化的价值，重新理解中华文明的基本理能推动中华民族不断进步的精神价值，这个文明在核心价值、制度模式、社会整合等方面的特征，它与其同；要说明中国人在新世纪里如何建设一个真正伟大、进步、引领世界潮流的文明，一个充满无穷魅力的民族主义，更不是人为地追求和西方相区别。

我相信，未来中国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是以王道代替霸道，其核心内容之一是行业的自治与理性化；之道仍将是伦理本位的、治人而不是治法的、贤能主导而不是制度主导的；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仍将是仁不是一个缺乏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的社会，也不会反对后者。